

## 双重转变：沙特部落与 国家的形成<sup>\*</sup>

〔以色列〕约瑟夫·康斯蒂尔 著 尹 婧 译<sup>\*\*</sup>

**内容提要** 沙特国家形成的各个阶段都受到了部落价值观的影响，沙特国家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包括变革期与调整期。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这个时期的特点是领土扩张和社会整合。国家初步确定了新的国家制度和官僚机构，起到了限制部落权力的作用，但部落行为模式和部落价值观仍在国家盛行，社会结构也未发生根本性转变。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是国家基础设施建立、完善和社会管理的巩固时期。沙特通过重构其政体逐步建立起部落与国家互动的新模式，部落价值观也开始与国家体制融合。部落权力与价值观作用的转变是理解沙特国家形成的关键。

**关键词** 国家形成 部落价值观 中央集权

沙特国家的发展反映了以内志为中心的传统部落社会与急剧变化的社会之间的碰撞。在应对这些变化时，沙特国家逐步完成了在政府、领土和社会等方面的构建。

20世纪早期，沙特社会分裂为许多部落，这些部落居住在阿拉伯半岛中部和北部地区，过着集体生活。沙特核心区域内志、盖西姆<sup>①</sup>和阿尔

---

\* 本文译自 Joseph Kostiner, "Transforming Dualities: Tribe and State Formation in Saudi Arabia," in Philip S. Khoury, Joseph Kostiner eds., *Tribe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约瑟夫·康斯蒂尔 (1949—2010)，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教授，研究方向为中东史，尤其关注沙特和也门；尹婧，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① 盖西姆：沙特阿拉伯内志高原东北部的绿洲群，属盖西姆埃米尔区。本区为沙特并灌最发达的地区，有许多绿洲，出产椰枣、葡萄、石榴、杏子、桃子和西瓜等。——译者注。

阿萨<sup>①</sup>的大多数居民从事游牧活动。在第一沙特王国(1744~1822)和第二沙特王国(1823~1891)时期,沙特的政治组织形式是酋长制,即部落由酋长统治。1902年,沙特国王伊本·沙特<sup>②</sup>重建了酋长国,部落、城镇居民和城市管理者分享权力,在此基础上维系各地区的自治与基于个体的合作联盟,特别是部落领导人之间以及部落领导人与统治者之间的合作。

沙特酋长国时期,部落对国家形成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部落是重要的军事力量,同时也是护送贸易车队的主要力量。部落拥有部队来与敌人战斗和开疆拓土,因而被视为瓦哈比事业的践行者,并且对酋长国的外交关系有很大影响。但是,作为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和精神领袖,沙特家族的统治者和乌里玛(受过宗教科学教育)仍掌控着国家的最高权力,各部落及其酋长未被纳入权力结构中,也没有在政府担任职务。另一方面,部落是酋长国的组成部分,也是价值体系的主要来源。游牧民和定居民的忠诚和居住模式受部落界线的影响而被分割,但共有的价值观包括政治分权、最低限度的管理、任人唯亲、社会团结、经济合作和依据部落放牧区域来界定领土等。国家形成的不同阶段都受到了这些价值观的影响。

瓦哈比一神论是酋长国的意识形态,为政权提供政治合法性。它是民众对抗外部敌人的共同信条,而不是一个临时的政治信条。<sup>③</sup>部落权力和价值观作用的转变是理解沙特国家形成的关键。

沙特国家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包括变革期和随后的调整期。其中一个变革期开始于20世纪初到20年代。这个时期的特点是领土扩张和整合新征服地区的人口。因此,接下来的几十年的主要任务是加强中央集权和划定领土。另一个变革期是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这一阶段是国家基础设施的建立、完善和社会管理的巩固时期。80年代,沙特再一次进入调整期,以变化和调整为中心逐步发展。

① 阿尔阿萨:属沙特东部省,盛产椰枣。——译者注。

② 伊本·沙特(约1880—1953):全名为阿卜杜拉·阿齐兹·伊本·沙特,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创立者,1932~1953年在位。——译者注。

③ Aziz al-Azmeh, "Wahhabite Polity," in Ian Richardson Netton, ed., *Arabia and the Gulf: From Traditional Society to Modern States* (Tatawa, N. J., 1986), pp. 75-90; C. Moss Helms, *The Cohesion of Saudi Arabia* (London, 1981), pp. 29-75.

## 一 国家形成的转折点

许多学者认为，现代沙特国家的形成始于 1881 年伊本·沙特的出生或是 1902 年他占领拉希德家族控制下的利雅得。<sup>①</sup> 然而，这些论断并不准确。19 世纪 80 年代第二沙特王国部落派系之间的内战为王国再度覆灭埋下了祸根，最终于 1891 年被拉希德家族占领。<sup>②</sup> 即使后来沙特国家逐步强大，占领了利雅得，但这并非是国家脱离酋长模式的标志。伊本·沙特统治期间处理对外关系日益老练，尤其是与英国达成了和解，这表明他的政治潜力很大。<sup>③</sup> 但是，部落集团和伊本·沙特个性化、非制度化的统治之间的合作是试探性且脆弱的。<sup>④</sup> 由此可见，此时的沙特国家是传统酋长国的翻版。

国家形成的表现是脱离酋长模式和具有更多国家属性。由于阿尔阿萨和盖西姆地区马匹、骆驼和过境贸易（分别沿着海湾沿海地区和杰贝勒沙马尔<sup>⑤</sup>的南部地区）的增加，当地居民要求政府提升管理水平（1906 ~ 1909），同时有利于伊本·沙特能够将领土扩张至阿尔阿萨（1913）。<sup>⑥</sup> 在应对一战期间战略和经济的挑战时，沙特逐步完成了国家的构建。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尤其是英国的渗透对该地区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为了赢得战争，两国争相与地方酋长结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拉希德家族结盟，而英国与科威特的埃米尔穆巴拉克（Mubarak）、伊本·沙特、汉志的谢里夫侯赛因和阿西尔的伊德里斯（al-Idrisi of 'Asir）结盟。大国的经济援助流入各自的地方盟友手中；由哈希姆家族领导、英国支持的

① See, for instance, D. Holden and R. Johns, *The House of Saud*, London, 1981; L. P. Goldrup, "Saudi Arabia, 1902 - 1932: The Development of a Wahhabi Society"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71).

② M. J. Crawford, "Civil War, Foreign Interven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A Nineteenth-Century Sa'udi Qadi's Dilemm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4, 1982, pp. 227 - 248.

③ Jacob Goldberg, *The Foreign Policy of Saudi Arabia, the Formative Years 1902 - 1918*, Cambridge, 1986.

④ Holden and Johns, *House of Saud*, pp. 23 - 38.

⑤ 杰贝勒沙马尔：沙特西北部山区，西邻汉志地区，东接东部省。世世代代居住着沙马尔部落。——译者注。

⑥ H. St. John B. Philby, *The Heart of Arabia*, London, 1923, pp. 92 - 96.

阿拉伯大起义(起义的第一年英国每月的援助资金达125000英镑)的爆发就是英国争取盟友的证据。此外,为了阻止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驻扎在汉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军队获得供给,英国直接封锁了红海港口和波斯湾的科威特。<sup>①</sup>红海的封锁、拉希德家族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合作几乎封闭了从内志经杰贝勒沙马尔到叙利亚的传统陆路商队线路。但与此同时,新的贸易中心和商队路线逐渐兴起,如从科威特到杰贝勒沙马尔的哈伊勒<sup>②</sup>的走私路线。

新形势对沙特酋长国的发展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挑战。在国家体制尚未成熟而不足以应对这些挑战时,国家极易发生变革。在新形势下,部落集团提升了自治水平,寻求与新的经济受益者结盟,并且沿着新的贸易路线居住。哈希姆王朝因领导了阿拉伯大起义而吸引了许多部落依附。此外,各酋长国的统治者对新贸易中心的争夺日益增加。奥斯曼帝国政策的多样性和英国各地的代理人也对酋长国之间的竞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英国设在开罗的阿拉伯事务局、设在波斯湾的印度事务局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和亚丁湾的事务局各自支持不同的阿拉伯地方统治者。因此,领导阿拉伯大起义的哈希姆家族与科威特、阿西尔以及内志领导人的关系疏远。在这种形势下,沙特不得不对各个地区的竞争者,还有地区新的主导者带来的挑战。战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溃,由英国主导阿拉伯半岛的局势,制定该地区未来战略和经济游戏规则,将其纳入欧洲全球战略体系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sup>③</sup>

新的挑战为沙特酋长国开辟了变革的路径。为了克服上述困难,国家从两方面采取了策略来应对:一是领土扩张,征服新的商业和战略地区,在军事上战胜其他酋长国;二是团结国家各部落,整合新征服地区以及为战后做准备。这些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时是和谐的,但通常是矛盾和不对称的。由此,国家的形成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

① See Joseph Kostiner, "The Hashimite 'Tribal Confederacy' of the Arab Revolt, 1916 - 1917," in E. Ingram, ed.,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Essays in Honour of Elie Kedourie*, London, 1986, pp. 126 - 143.

② 哈伊勒:沙特西南部内志地区的绿洲城市,是哈伊勒省的首府。该地居民以农业为主,主要出产谷物、海枣和水果,哈伊勒省出产的小麦更占全国的大部分。——译者注。

③ See Brinton Cooper Busch, *Britain, India and the Arabs 1914 - 1928*,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71, pp. 164 - 268.

## 二 扩张与巩固

沙特国家的形成类似于前伊斯兰时代帝国的建立。正如本文提到的爱尔兰·拉皮德斯 (Ira Lapidus) 所言, 沙特的社会变迁如同酋长国的领土扩张的征服运动。酋长国的模式并未被废除, 而被应用于国家的征服运动中。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部落权力和部落价值体系的影响空前突出。

部落是领土扩张的推动力。部落冲突为沙特介入冲突地区提供了契机, 因而成为推进征服运动的催化剂。正是由于沙特控制下的乌太巴部落 ('Utayba) 和苏贝部落 (Subay') 与胡尔马特 (Khurma) 周边的哈希姆家族之间的冲突, 还有沙特控制下的木太儿部落 (Mutayr) 和拉希德家族领导的沙马尔部落 (Shammar) 之间的冲突 (这两个部落都是海湾阿季曼部落 'Ujman tribe 的盟友), 沙特于 1918 ~ 1919 年与科威特、拉希德家族和汉志酋长国展开了斗争。1920 年, 情况发生了变化。伊本·沙特发现, 在哈希姆家族和拉希德家族的领导下逐渐形成了反沙特的联盟, 因此他开始构建有序的战略和军事占领策略——沙特国家军队陆续占领了拉希德酋长国 (1921 年 11 月) 北部的阿西尔地区 (1920 ~ 1923) 和汉志 (1924 ~ 1925)。

即使在沙特有序的领土扩张下, 本地部落之间的战斗往往决定着国家推进征服运动的时机与战略。1920 年, 木太儿部落与科威特军队在贾赫拉 (Jahra) 的战争为伊本·沙特的干预提供了机会。艾德氏族 (al-'Aid clan) 在阿西尔的叛乱引发了沙特周期性的报复活动。1924 年 7 月, 木太儿部落在汉志塔伊夫镇的惨败使得伊本·沙特在汉志放缓了征服行动, 并采用了长期围攻地方城镇的策略。

新征服的省份因部落活动转而成为冲突的场所。沙特部落常常劫掠本地居民, 有时也劫掠邻国伊拉克和外约旦。多年来, 与伊拉克和科威特毗邻的汉志北部地区、焦夫 (al-Jawf)、杰贝勒沙马尔北部以及内志北部地区的部落冲突持续不断, 而部落之间的争斗有利于沙特介入并占领这些地区。<sup>①</sup>

在最初整合的过程中, 部落价值观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整合的一

① On Saudi occupation, see Amin al-Rihani, *Tārīkh Najd wa-Mulhaqatihi*, Beirut, 1928; Muhammad al-Shahari, *Al-Matami' al-Tawwasū'iyya al-Sa'ūdiyya fil-Yaman*, Beirut, 1979; Sadiq Hasan al-Sudani, *Al-'Ilaqat al-'Iraqiyya al-Sa'ūdiyya 1920 - 1931*, Baghdad, 1975.

种方式是伊本·沙特或沙特家族的其他成员与不同的游牧家庭和城镇家庭联姻。伊本·沙特的顾问约翰·菲尔比(John Philby)是1917年英国派往沙特的间谍,他发现伊本·沙特利用了瓦哈比可同时与四个女性结婚的权利,频繁地离婚与再婚,伊本·沙特就这样与许多部落结为盟友。<sup>①</sup>另一个方式使伊本·沙特为自身及酋长国塑造了良好的形象。亲沙特的军队在与侯赛因军队冲突的初期获得了胜利,加之伊本·沙特发放战利品十分慷慨以及1920年之前征收的赋税较低,沙特因此而拥有了良好的形象。伊本·沙特与侯赛因对待叛乱部落的态度不同,侯赛因态度武断且不留余地,而伊本·沙特通过血缘关系和战利品政策为他赢得了这些部落的支持并顺利与之结为盟友。但是在此过程中,部落结构和行为模式并未发生改变。

在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是建立伊赫万组织和推动伊赫万运动。1912年特别是1916年以来,沙特在伊赫万组织基础上建立了农业垦殖区“希吉拉”。针对动荡不安的乌太巴部落、哈尔卜部落(Harb)、木太儿部落以及夸坦部落(Qahtan)建立“希吉拉”,为了使其完成特定的任务来巩固国家;对于游牧部落,建立“希吉拉”是为了促使游牧民定居,卖掉骆驼和羊,放弃传统的游牧习性、劫掠及叛乱活动。伊赫万组织打破氏族壁垒,用瓦哈比派教义将各部落结为一体。这些部落更加团结与忠诚,并且引导其他部落改信瓦哈比教义,从而间接对国家予以支持。此外,伊本·沙特利用伊赫万的军事才能,将他们转编为常备军来为国家战斗。<sup>②</sup>虽然一些西方观察家将这一行为看作伊本·沙特精心策划的对“人的本性的攻击”<sup>③</sup>,但是伊赫万真正的性质更加复杂,也是沙特征服运动中部落价值观的广泛性与部落权力重要性的例证。

伊赫万主要有三个特征:传统的军事威力、狂热的宗教热情和不受制于政府立场。在沙特扩张与巩固的过程中,伊赫万是打败拉希德家族的三大支柱之一。伊赫万是伊本·沙特的儿子费萨尔驻扎于阿西尔('Asir)军队的一部分,并且是占领汉志、塔伊夫和麦加的主要军事力量。此外,作为先锋、狂热的传教者以及定居生活的推广者,伊赫万成为沙特非军事扩

① Philby, *Heart of Arabia*, pp. 293 - 294.

② See Joseph Kostiner, "On Instruments and Their Designers: The Ikhwan of Najd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Saudi State," i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1, No. 3, July 1985, pp. 298 - 323.

③ See K. Williams, *Ibn Sa'ud the Puritan King of Arabia*, London, 1938, pp. 63 - 64.

张的核心。

但是，部落走向定居化、宗教复兴和履行军事职责，这样的上层建筑不可避免地部落下层结构产生了无法预测的影响。因此，伊赫万运动的推进没有统一标准，既不受控制，也不彻底。在运动中表现突出的集团属于木太儿部落、夸坦部落、乌太巴部落和阿季曼部落，他们并没有全部定居，而是继续保持游牧掠夺的习性与部落模式。他们将部落的宗派主义和无法无天的习性与宗教复兴的狂热结合起来。宗教复兴运动易被接受的特性，如从外在上改变了生活方式和衣着，再加上对暴力的狂热，致使伊赫万具有吸引力，变得十分强大。伊赫万运动超出了伊本·沙特控制的地区，推进到了海湾沿岸、鲁卜哈利沙漠以及外约旦与伊拉克的南部地区。<sup>①</sup> 这种不受控制的扩张所产生的劫掠活动并未得到伊本·沙特的许可，并且引发了与邻国和新征服地区居民的冲突。进一步来说，沙特对新省份居民的整合是通过强制改宗进行的，而这削弱了这些省份居民对国家的向心力。伊赫万活动也引发了沙特统治精英内部的斗争。伊赫万领导人在传统的权力结构中没有位置，只是依赖于他们高尚的精神目标。伊赫万领导人日益成为压力集团，不受包括乌里玛和沙特家族成员等原有统治集团的限制。伊赫万试图迫使伊本·沙特在全国实行瓦哈比复兴主义的政策，尤其是在教育方面。<sup>②</sup> 伊赫万与乌里玛以及城市居民的关系日益紧张；伊本·沙特不得不在农业垦殖区修正他们的宗教教义。1919年，他要求纳季德高级乌里玛颁布一个费特瓦<sup>③</sup>，表明“伊赫万主义”的伊斯兰教不优于普特的瓦哈比实践。因此，伊赫万的权力在首都受到了削弱。<sup>④</sup>

沙特扩张的过程给酋长制带来了新的挑战。一些新征服地区的居民并不忠于沙特：北部的沙马尔部落向伊拉克渗透，汉志难以适应以复兴主义

① H. Wahbah, *Arabian Days*, London, 1964, pp. 128 - 129; H. St. John Philby, *Diary of Political Mission to Central Arabia 1917 - 1918*, Vol. 2, Cairo to Riyadh, 13 April 1918, Philby Papers,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② Arab Bulletin, No. 108, 11 January 1919, report by Philby, British Public Record Office (henceforth BPRO), FO 882/21; H. Dickson (British political agent in Bahrain and later in Kuwait), notes on the Akhwan Movement, 5 March 1920, FO IS/19/15.

③ 费特瓦：伊斯兰法学家就某一问题根据《古兰经》、穆罕默德言行审慎考虑而引申出来的处理意见或裁断说明。——译者注。

④ Arab Bulletin, No. 108, 11 January 1919, report by Gertrude Bell (British official at Baghdad), 23 August 1920, BPRO, FO 371/5061/E 3798.

的宗教教义、游牧习性以及简单的政治文化为特征的沙特政权,因为这与生活方式更具商业性的汉志截然不同。伊赫万的劫掠和外约旦、伊拉克、也门部落的反劫掠活动使伊本·沙特卷入了也门伊玛目与统治外约旦和伊拉克的哈希姆家族的纠纷中。此外,哈希姆家族对外约旦和伊拉克统治的背后隐约可见英国的身影,因此沙特需要调节与英国和其他欧洲大国的关系。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穆斯林的目标是朝圣,所以沙特政府需要完善对朝圣活动的管理。传统统治阶层与日益兴起的压力集团之间的斗争要求沙特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政府。

虽然沙特对新地区的控制代价很高,但是也获得了新的经济机会。1917年,英国开始给予内志补贴。此后,每年补贴的资金总额达5000英镑。20世纪20年代早期,英国的补贴数以万计。但是,随着英国与内志因科威特会议(目的是全面解决此地区的边界划分)而造成的关系恶化以及英国需要削减日益增多的战争费用,英国最终于1924年终止了对内志的补贴,<sup>①</sup>沙特领导人不得不寻找新的收入来源。由于科威特海关向纳季德部落在科威特港口的交易征收税款,伊本·沙特向科威特索要了较大份额,并且利用这笔钱为部落建立了新的贸易线路,同时也刺激了他通过海关攫取收入。1922年,美国冒险商人,如查尔斯·克兰(Charles Crane)和弗兰克·霍姆斯(Frank Holmes)开始在海湾地区寻找矿产,进一步刺激了伊本·沙特对发展国家经济的兴趣。20世纪20年代中期,沙特每年从朝圣中获得的收入将近10万英镑。

为了应对占领区域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沙特具有了更多的国家属性。这是沙特第一次进行中央集权,此后沙特具有了重要的国家属性,即中央政府高于社会中的其他集团。<sup>②</sup>1917年以来,伊本·沙特的威望迅速上升,一是由于他是首位提出对英外交政策的领导人,随即成为值得信赖的对话者;二是在扩张时期,伊本·沙特被视为伊赫万的领导人和传统精英的保卫者(如乌里玛和商人),同时也是新占领地区民众抵抗伊赫万劫掠活动的保卫者。此前,伊本·沙特和他的祖先一直是酋长。但是,现在作为所有社

<sup>①</sup> The decision was made in 1923.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to Viceroy, India, 18 April 1923, BPRO, FO 371/8937/E 4019.

<sup>②</sup> Ronald Cohen, *Introduction to Ronald Cohen and Elman Service*, eds., *Origins of the State*, Philadelphia, 1978, pp. 1-20.



会集团之间可信赖的调解者、外交政策的缔造者，伊本·沙特已经不再仅仅是领头羊。1917年，他成为汉志的国王。1927年，他又成了内志的国王。

伊本·沙特为了使其领导更具实质性，进而创建了一整套行政机构。与西方相比，他利用的是城市阶层的流动性，通过各个阶层的斗争将权力集中于政府。沙特官僚大多为地方领导人，既是应急手段，也具有较高实用性。面临新占领区域与伊赫万难以驾驭的双重挑战，伊本·沙特必须寻求应对之计。在占领汉志以后，沙特建立了许多政府部门。1931年，沙特建立了由外交、内政和财政大臣组成的汉志大臣会议。1953年10月，伊本·沙特去世以前，汉志大臣会议一直是一个统一体。1954年，伊本·沙特的继任者沙特国王<sup>①</sup>将其重新改组为大臣会议。20世纪20年代，伊本·沙特在汉志建立了常备军，雇用了许多叙利亚和埃及的顾问来提供专家意见，使他能够不受地方既得利益者的影响来制定政策。1925年，伊本·沙特又建立了汉志咨议会议（相当于协商会议），由汉志显要组成。伊本·沙特的儿子费萨尔主持汉志大臣会议和汉志咨议会议。<sup>②</sup>

沙特加强中央集权的途径主要是增强政府对地方的控制。1920年至1921年，由沙特家族成员组成的新的城镇长官网建立，并且逐渐稳定。在占领汉志不到一年后，瓦哈比教义成为全国的法律。皇室与被占领地区显要家庭联姻使得地方显要进入了国家的权力中心。20世纪20年代晚期，国家建成了电报通信网。为了方便政府车辆的通行，国家还建立了交通运输网。政府对纳季德部落征收更高的赋税，迫使他们只能在关税也很高的新港口朱拜勒和海湾的胡富夫从事贸易。沙特将家族统治、宗教规范、集权经济和现代技术相结合，目的就在于抑制地方权力。<sup>③</sup>

为了解决新的问题，政府形成了新的领土概念。英国倡导的划定边界线的观念取代了地方盛行的依据部落放牧区域来定界的观念。随着英国对

① 沙特国王（1902—1969）：全名为沙特·本·阿卜杜勒·阿齐兹。1953年11月继任国王。1964年11月，在许多亲王和大臣的支持下，沙特被王室长老委员会废黜，其弟费萨尔成为第三任国王。1969年逝世于希腊雅典。——译者注。

② On the making of Saudi institutions, see E Hamza, *Al-Bilad al-ʿarabiyya al-saʿudiyya*, Riyadh, 1961; see also Ghazi Shanneik, “Die Modernisierung des Traditionellen Politischen Systems,” in Thomas Koszinowski, ed., *Saudi-Arabien: Ölmacht und Entwicklungs Land*, Hamburg, 1983, pp. 151–176.

③ Kostiner, “On Instruments.”

拉希德政权领土的占领,沙特北部与英国统治的外约旦和伊拉克相接壤。于是,为了确保该地区亲英国家的稳定,英国要求划定边界线。在签订1922年5月的《穆哈迈尔条约》(*Muhamara*)和1922年12月的《乌凯尔条约》<sup>①</sup>时,伊本·沙特不得不放弃边界灵活、依据部落放牧区域定界的观念,被迫接受划定边界线的观念。1925年秋,在哈德和巴霍尔会议期间,沙特签订了与伊拉克、外约旦划定边界的协议。<sup>②</sup>一位英国旁观者目睹了乌凯尔会议的过程,生动地描述了双方对强加边界线与部落边界线看法的冲突。英国驻伊拉克最高专员珀西·考克斯(Percy Cox)认为,伊本·沙特的“部落边界观念”十分幼稚。在纳季德部落统治者哭诉的背景下,考克斯用一支铅笔“很认真地画了一条边界线”<sup>③</sup>。

1924年12月,沙特占领麦加后,伊本·沙特放弃了以往的征服与扩张政策,寻求维护地区和平。为了使英国、荷兰以及其他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政府信服,到沙特朝圣是安全的,政府实施了许多国际合作的措施。20世纪30年代,沙特签署了一系列边界划定条约,与邻国关系逐步制度化,与此同时,大多数周边国家对沙特国家予以承认。沙特在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划定了国家的边界,确立了新的领土范围。通过依赖地区和平和强有力的政府,伊本·沙特和他的助手们希求在汉志城市精英的推动下将国家塑造为朝圣和贸易的中心。<sup>④</sup>

这些变化促使国家形成与部落权力及价值观之间的互动更加复杂。沙特建立的新政体打破了部落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平衡。沙特形成了新的内部机制和外交政策,取代了过去曾经兴盛的酋长制度。部落集团尤其是伊赫万组织是旧政体向新政体转变过程中积极的推动者。

因此,在占领汉志之前,曾有报告表明,伊本·沙特限制纳季德部落在科威特市场贸易,将纳季德部落引导至他全力发展的阿尔阿萨港口贸易,

① 《乌凯尔条约》:1922年沙特与英国签订的划定沙特内志东北边界的条约。该条约将沙特政权原来控制的内志部分地区划给了伊拉克和科威特。同时,条约还规定成立两个缓冲区,一个在伊拉克和内志之间,一个在内志和科威特之间,这两个缓冲区后来在1942年改称“中立区”。——译者注。

② R. O. Collins, ed., *An Arabian Diary: Sir Gilbert Falkinham Clayt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9.

③ Quoted by H. R. P. Dickson, *Kuwait and Her Neighbours*, London, 1968, p. 273.

④ Political Agent in Kuwait to Resident, Bushire, 1 July 1929, BPRO, FO 371/13737/E 4330.

并增加了已经很繁重的赋税。<sup>①</sup> 据其他报告表明，伊本·沙特要求（正如科威特会议期间表明的那样）伊拉克和外约旦之间建立一个领土走廊，不仅是为了将对手哈希姆王国分裂为两个部分，而且也是为了在动荡的北部部落地区获得领土优势，这样使他能够吞并，至少是控制北部部落的游牧区域，镇压他们反抗。<sup>②</sup>

纳季德部落是沙特部落酋长国的核心，新政体却将包括他们在内的部落排除在国家机器之外。因此，虽然伊赫万的领导人，木太儿部落的酋长费萨尔·达维什（Faysal Al-Dawish）和乌太巴部落的酋长苏勒坦·伊本·比扎德（Sultan Ibn Humayd）在占领汉志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却没有在新的行政管理中受到重用。此外，中央集权政策直接威胁了部落自治。由于通信、运输和政府机器的改善，部落作为领土的领主和商队路线管理者的地位将会受到限制。政府已经使用了经济手段来压制他们，如增加赋税，强加贸易中心以及禁止劫掠其他国家。伊本·沙特与英国、汉志显要和外国顾问的联系日益增多，这些都证明国家的统治者，一个曾经遵循部落国家准则和瓦哈比教义的人，脱离了过去转而追随外国行为的准则。<sup>③</sup>

因此，伊赫万对伊本·沙特的反对立场不应被解释为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由于宗教狂热。伊赫万表达了纳季德部落的要求，主张国家是一个内部部落自治、自由劫掠、保护贸易权的酋长国。伊赫万的长官费萨尔·伊本·希比莱恩（Faysal Ibn Shiblyayn）在与英国官员会见中，很清楚地表达了伊本·沙特对“部落自治的限制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sup>④</sup> 因此，沙特形成了两大对立集团和竞争体系：中央集权的沙特政府和伊赫万部落集团。1927~1929年，伊赫万公开挑战伊本·沙特制定的新准则，双方争相寻求纳季德部落成员的支持；1929~1930年，伊本·沙特成功粉碎了伊赫万的叛乱。

在20世纪30年代，部落叛乱的规模并不大。“自由汉志党”（Hijazi

① Political Agent in Kuwait to Resident, Bushire, 7 July 1923, BPRO, CO 727/5/40377; Political Agent in Kuwait to Resident, Bushire, 12 July 1923, CO 727/5/40377.

② Ramadi to Air Staff Intelligence, 9 January 1925, BPRO, AIR 23/3.

③ Political Agent in Kuwait to Resident, Bushire, 1 July 1929, BPRO, FO 371/13737/E 4330; Kostiner, "On Instruments".

④ Political Agent in Kuwait to Resident, Bushire, 1 July 1929, BPRO, FO 371/13737/E 4330, includes an interview with an Ikhwan leader, Faysal Ibn-Shiblyayn.

Liberation Party) 妄图推翻沙特对汉志的统治。在“自由汉志党”的鼓动下,比利部落(Billi)于1932年在汉志北部发动叛乱,阿西尔部落进行效仿并于1933年发动叛乱。但是,沙特使用高压手段征收高额赋税,地区长官的专制以及政府考虑不周也是部落发动叛乱的原因。阿西尔部落的叛乱引发了1934年沙特与也门的战争,即便如此,政府很轻易就粉碎了叛乱,并且在与也门的战争中赢得了胜利。<sup>①</sup>

沙特对中央集权、经济发展和地区和平的重视并未产生一个新的、深入人心的价值体系。实际上,沙特政权是世袭政体,<sup>②</sup>是家族纽带和任人唯亲占主导地位的个人统治,并不能起到社会渗透和制度化的作用。这样的政体是对伊斯兰帝国经典模式的模仿。新政体的变化表现在最高权力、宗教法律和经济方面,但是社会没有改变,仍旧由传统部落组成。在阿拉伯大起义之后,侯赛因王国的政体也是如此,<sup>③</sup>这为伊本·沙特提供了范例。伊本·沙特和他的助手没有为更实质性的社会变革做好准备,他们的精力都消耗在持续不断的内部斗争和外部竞争中,没有精力去关注社会变革。经济危机的长期性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在占领汉志后,国家收入来自朝圣活动和汉志贸易商缴纳的赋税,从每年10万英镑增长到400万~500万英镑。<sup>④</sup>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世界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沙特经济,每年朝圣的平均人数从10万人跌落至3万~4万人,收入下降了60%~70%。政府对新建基础设施的一些外国公司负有严重的债务。与常理相反,1938年,在阿尔阿萨发现的具有商业价值的石油并未直接彻底地修复国家经济。在战争期间及战后,石油产量一直很低(1946年每天164000桶),利润也很少,因此伊本·沙特十分渴望获得美国的财政援助。随后的几年,石油产量翻了五倍。在沙特与阿美石油公司签订的合约中,政府占有份额逐渐增多,1950年沙特的利润达到5670万美元,1951年达到11000万美元。但是,在国家管理效率低下的情况下,阿美石油公司帮助政府获得武器,并

① “Tentative Outline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War between Ibn Saūd and the Imam Yahya, 1933 - 1934,” Sir Andrew Ryan Papers, Box 6/7,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

② 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alcott Parsons, Cambridge, Mass., 1984, pp. 346 - 352.

③ Kostiner, “Hashimite ‘Tribal Confederacy’”.

④ Ryan to Henderson, 4 March 1931, British India Office Records (henceforth BIOR), L/P&S/12/2073, PZ 2449.

且帮助其于 1946 年修建连接红海与内陆的铁路。<sup>①</sup> 1958 年，当费萨尔着手经济改革时，政府欠纽约银行的债务达 9200 万美元，欠其他外国贷款人的债务达 4000 万美元。此外，沙特国内债务还有 12000 万里亚尔。<sup>②</sup>

虽然部落权力受到了限制，但部落价值观仍在国家政体盛行。部落价值观适用于世袭政权，因而旧的社会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在沙特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双重性一直存在。20 世纪 20 年代，中央集权和部落体系争相成为价值体系。之后的 35 年，政府的中央集权和发展政策占主导地位，但内在实质仍是部落体制。

这种外在表现为现代国家但内在实质仍为部落体制的“胶囊型”模式体现在国家形成的诸多方面。在政府决策方面，官僚式的程序和制度之后隐约可见非正式的部落行为。沙特有许多类似大臣的办公室、汉志的部分显要组成的咨询委员会以及地方长官体系。然而，有报告表明，国家的实权是世袭的，如酋长一样的统治者的权力源于自身，并且将实权谨慎地赋予菲尔比所称的秘密委员会（Privy Council）的一些贴身顾问。秘密委员会主要包括汉志显要，并于 20 世纪 30 年代不再发挥作用。这些大臣们没有集体责任心，也没有像内阁一样的集体行动，他们对国王个人负责。秘密委员会的成员由国王挑选，有伊本·沙特的儿子、顾问、地方长官及其他人，具体包括叙利亚顾问优素福·亚森（Yusuf Yasin）和福阿德·哈姆扎（Fuad Hamza）、菲尔比（Philby）、费萨尔亲王（Faysal）和沙特国王（Sa'ud）以及财政部长阿卜杜拉·苏莱曼（Abdullah Sulayman）。<sup>③</sup> 这个机构基于酋长模式将实权人物非正式地聚集在一起。每周会见乌里玛的行为是酋长制的典型特征，这种宗教行为完善了这个机构的设置。<sup>④</sup> 但是，国家的决定基本都是随意而为的，大多出于伊本·沙特的个人意愿。

1954 年，大臣会议每月召开一次，通过简单多数的投票原则做出决定，没有为主席留出决策的空间，由此政府机关拥有更大的权力，目的是取代

① Holden and Johns, *House of Saud*, pp. 123 – 175; see also M. Abir, “The Consolidating of the Ruling Class and the New Elites in Saudi Arabia,”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3, No. 2, April 1987.

② Faysal's Financial Reforms, March 1958. January 1960, 28 January 1960, United States National Archives (henceforth NA).

③ Notes on Saudi Arabia for Dr. Hugh Scott, 29 August 1944, Philby Papers Box 16/5.

④ Abir, “Consolidating of the Ruling Class”.

早期世袭制。沙特国王主持大臣会议,但他总是忽视或者反对内阁的建议。内阁成为沙特国王反对者尤其是其弟费萨尔的堡垒。<sup>①</sup>

沙特国家缺乏制度化,国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王的领导。在伊本·沙特(直到1953年)和沙特国王(直到1964年)执政期间,沙特国家实力还很薄弱。伊本·沙特极具个人魅力,但在击败伊赫万之后,他开始厌战,与之前伙伴的战斗也令他感到沮丧,逐渐对国家事务失去了兴趣。20世纪30年代中期,伊本·沙特的士气才有所恢复,但是在接下来的10年他并未完全掌控国家事务。在执政的最后10年,他被疾病所困扰,体质下降。然而,如果没有伊本·沙特的推动,他的助手们不会如此努力地建设国家。伊本·沙特的儿子沙特国王在经济决策十分上草率,外交政策在亲纳赛尔主义和亲美之间举棋不定,种种迹象表明他治国乏术。

在经济管理方面,外在表现为现代国家但内在实质仍为部落体制的“胶囊型”模式更加突出。1933年,沙特引入了预算机制,但只对政府开支进行预算。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勘探自然资源(石油、水和黄金)。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40年代国家缺乏王室领导,公众资金和私人钱包没有真正的区别。阿卜杜拉·苏莱曼更像是酋长国中统治家族的私人代理人,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大臣。苏莱曼尽力满足王室需求,先向某一处借款,再向另一处借款偿还之前的债务,而且难以遏止数以百万的沙特银里亚尔的走私活动。1932年,为了使沙特货币标准化和制定平衡的预算,苏莱曼建立了沙特阿拉伯货币管理局。但是,沙特国王在宫殿和奢侈品上的环节制,与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Aristotle Onassis)关于购买油船队的商业协议<sup>②</sup>最终失败,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酋长制的寿命。<sup>③</sup>

“胶囊型”模式也体现在地区合并上。1932年8月,伊本·沙特宣称,

① Background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Conflict within the Saudi Ruling Family, 1 April 1958, Intelligence Report No. 7692, NA.

② 1954年1月20日,沙特王国与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签订了《吉达协定》,主要内容包括:成立“沙特阿拉伯油船海运有限公司”;拥有一支总吨位为55万吨的油船队;拥有沙特油田开采的石油的运输垄断权。《吉达协定》的签订震惊了全球,给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阿美石油公司致命地打击。美国向沙特国王施加压力,扬言将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并实行食品禁运等贸易制裁,而且还要断绝一切援助。面对巨大的压力,年轻的沙特国王便单方面撕毁了《吉达协定》。——译者注。

③ Holden and Johns, *House of Saud*, pp. 179 - 197.

统一的沙特阿拉伯王国建立，王位继承者是其子沙特，王国继续保持瓦哈比法律规范和约束力，但是这些社会整合的行为与酋长制时期十分相似。除此之外，地区差异盛行。汉志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也是国家新的神经中枢。沙特的外国顾问西方商人在汉志勘探矿产资源，富有的地方贸易商在这里规划王国经济的未来，希望他们的想法能够传到秘密委员会成员的耳中。与汉志相比，内志是旧的国家中心，那里的居民感到自身地位日益下降。纳季德部落为国家的军事服务，不可否认这是一个有效的整合方式，他们因没有获得更大报酬而感到失望。阿西尔没有占据任何重要位置，阿尔阿萨和盖西姆只有富有的贸易商，如库赛比家族（al-Qusaybi family）或阿卜杜拉·苏莱曼，他们与汉志大贸易商平起平坐。20世纪30年代，英国报告强调了这些地区居民的离心力和特殊性，而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了这一形势。<sup>①</sup>

20世纪40年代，汉志新的分离主义组织不断涌现，特别是1946年的汉志抵抗组织（Association of Hajazi Defense）。沙马尔部落的谢赫因指责沙特歧视他们而被放逐至伊拉克。<sup>②</sup>因此，沙特国家整合的水平并未达到基本的服从，社会仍旧以地区部落为界而四分五裂。

“胶囊型”模式也体现在地区管理上。沙特家族分支及其精心挑选的官员垄断地区管理权，他们提高赋税，控制地方部落。地区管理仍旧使用酋长制时期的策略，重视维持部落的忠诚，而不是将部落权力引至新的基于组织而建立的国家之上。伊本·沙特（和他之后的沙特国王）实行收买部落的补贴制度，这个制度避免了部落干预国家事务，并且确保了他们的满意度以及勉强向政府表示的忠诚。此外，直到1954年，官方的税收政策仍旧是一种确保外围部落顺从的手段。地方长官在特定的季节向各部落派遣税吏，根据宗教法原则收集税款，以实物集体支付。<sup>③</sup>

纳季德部落是唯一的例外，他们偶尔履行传统的军事职责，如镇压叛乱、参加沙特与也门的战争（1933~1934）。沙特建立了白军（国防军），有16000名活跃分子和32000名后备军人，还建立了主要由纳季德部落成员

① Joseph Kostiner, "The Making of Saudi Arabia" (manuscript in progress), Chap. 3.

② See Johannes Reissner, "Die Innenpolitik," in Koszinowski, ed., *Saudi-Arabian*, pp. 83-120.

③ *The Eastern Reaches of al-Hasa Province*, 31 January 1950, 886 2553/1-3150, NA; Muhammad al-Mana, *Arabia Unified* (London, 1980), p. 177.

组成的国民警卫队，这些军队的建立旨在遏制动乱。<sup>①</sup>

### 三 社会急速变迁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20世纪70年代，费萨尔国王统治时期是国家发生剧烈变革的另一个重要阶段。正如20世纪20年代的那次变革一样，20世纪60年代沙特重构政体，目的也是为了应对国内外战略和经济新形势的挑战。此后沙特具有了更多的国家属性，并创建了部落与国家互动的新模式。

在沙特国王统治时期，这种“胶囊型”模式在应对国内外新形势时毫无作用。沙特决策过程的任意性和无计划性无法应对激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颠覆活动和苏联与美国在中东对峙的影响，政府也未能阻止地区激进的趋势。最明显的例证是发生在1953年和1956年阿美石油公司仓库的大罢工。沙特国王在处理地区事务上含糊不清，优柔寡断。1957年下半年，沙特国王在访问华盛顿期间出乎意料地放弃了对埃及总统纳赛尔一向友好的态度。纳赛尔是阿拉伯激进主义的领导人，而沙特国王接受了艾森豪威尔主义，成为亲西方反激进主义阵营的领导人。1958年，沙特国王甚至被指控唆使他人刺杀纳赛尔总统。同时，沙特国王任意分配部落首领的津贴（目的是平息内部反对）、从奥纳西斯手中购买油船队徒劳无果、肆意投资建设清真寺以及在国内事务上轻率的决策方式都引起了民众的不满。

石油工人的罢工、部落忠诚的不确定性以及王子之间关于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产生的争斗既暴露了国家决策的弱点，也彰显了社会政治一体化的异常。“胶囊型”国家的特点是各集团之间表面的相互妥协，但在20世纪50年代，这不足以维持国家的稳定与建立合作。此外，虽然石油收入与日俱增，但是国家预算仍有赤字，文盲和医疗问题日益严重，公共建设难以满足需求。世袭的、太过简单的管理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费萨尔国王（1964~1975年在位）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官僚机构和制度建设。他采纳了1960年联合国专家、1963年福特基金会和1964年专家团提出的建议，利用越来越多的石油收入（1970年为10亿美

<sup>①</sup> Abir, “Consolidating of the Ruling Class”.



元，1980年为800亿美元)<sup>①</sup>推进现代化和提升公共管理。<sup>②</sup>第二，技术现代化。阿卜杜拉·本·阿齐兹·库赛比是一位前任大臣，也是改革的推动者。正如他所言，“如果我们希望摆脱现在的落后，那么不可避免地需要借鉴西方文明的某些方面，包括技术、物理和社会科学、管理程序和科学规划的准则”。<sup>③</sup>沙特在通信、交通、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建立了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加强了王国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提升了民众的生活水平。

但是，费萨尔和他的助手们并没有在社会文化方面进行改革，而是继续维持甚至促进伊斯兰教在社会中的作用，他们也没有正视新的社会分层、重新定居以及区际移民等现象。在费萨尔看来，“社会的复兴”依赖于新型教育制度的建立，<sup>④</sup>因此，他采纳了官僚主义的观点，将“社会的复兴”归因于国家在社会中的“因果作用”，<sup>⑤</sup>即通过扩大政府的作用来推动社会变迁，并使之成型。用韦伯（Weberian）的术语来说，费萨尔力图使沙特世袭政体惯例化。

秘密委员会作为非正式决策机制仍存在，但作用有限。政府机关监督不断扩大的官僚机构，并且执行政策。高级顾问包括费萨尔的心腹拉什迪·法伦（Rashad Farūn）、卡迈勒·阿德汗（Kamal Adham）和奥马尔·萨卡夫（'Umar Saqqaf）；伊本·沙特的兄弟；高级技术专家，如扎基·亚马尼（Zaki Al-Yamani）和阿卜杜拉·本·阿齐兹·库赛比（'Abd al-'Aziz al-Qusaybi，后来成了大臣）；宗教高级官员，阿卜杜拉·本·阿齐兹·伊本·巴兹（'Abd Al-'Aziz Ibn Baz）；其他高级乌里玛。费萨尔建立了一个由15人组成的大臣级会议，其继任者将此机构扩大至25人。国王和王储主持会议，以此来确保规划、工业、电力、市政和农村事务等各部门各司其职，协调发展。各部门都配有技术专家，这些专家的任用不以忠诚度作为标准，而是依据能力挑选，这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决策的科学化。

① Holden and Johns, *House of Saud*, pp. 255 - 357.

② Abd ulrahman M. Al-Sadhan, "The Modernisation of the Saudi Bureaucracy," in Willard A. Bell, ed., *King Faisal and the Modernisation of Saudi Arabia*, London, 1980, pp. 75 - 89.

③ Ghazi Algosaibi, *Arabian Essays*, London, 1982, p. 13.

④ Extracts from Faysal's speech at Ta'if on 5 September 1963, in *Gerald De-Gaury*, *Faisal* (London, 1965), pp. 169 - 176 (appendix).

⑤ Lisa Anderson, *The Stat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unisia and Libya, 1830 - 1980*, Princeton, 1986, pp. 270 - 279.

1968年中央计划厅的成立使得沙特实现了有序投资,这标志着政府权力的扩张已经进入到公共活动领域。虽然地方长官的任命与职责仍由国王直接决定(国王从王室家族和高级技术专家中挑选),但是政府的公务员已达40万人,他们对各省份形成了自身特定的态度。在中央集权方面,国家主权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准工时、医疗服务、最低工资法等福利体系在全国得到了推广。政府扩大权力机构,自此逐步实现自治。1970年,由专门部门监管的司法体系建立,该部门包括一个由20人组成的机构,它结合了沙里亚法和西方法律准则。<sup>①</sup> 人才的培训是国家的首要任务。成千上万的学生,包括女性开始上学;几万名学生在国内或者西方高校就读。居民区建立了卫生院和医院。伴随着行政改革,经济也进行了改革。除了石油工业,政府还鼓励石化工业的发展和投资。反过来,这些工业与基础设施的项目共同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如酒店、保险、航空、餐饮和建筑。

民众的整合是改革的另一个领域。经过费萨尔改革,王国从红海到波斯湾的主要城市通过空运相连。国家管理的重点是民众的整合,提高民众对就业培训、医疗服务和福利体系的依赖度。在现实意义上,社会不再是四分五裂,民众更加团结统一。

基于传统部落认同之上的地区团结明显有所松动。通过现代通信技术,部落与其他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部落的独立性下降而依赖性增强。新的地区部落认同没有出现,而地区排他认同受到削弱。<sup>②</sup>

与20世纪20年代的变革不同,这个时期的改革不但涉及政治领域和权力结构,而且涉及经济和社会方面。20世纪70年代中期,政府主导着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民众的经济条件有所好转,逐渐由谋求生计走向富裕,许多人喜欢舒适而非奢侈的生活。20世纪80年代,沙特社会只有35%的人处于勉强糊口的生活水平。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促使人口从农村和游牧地区移居城市,这些城市成为十分富裕的商业和工业中心。国家中心地区的城镇人口增加了数倍(例如吉达,20世纪50年代为6万人,20世纪80年代

① Holden and Johns, *House of Saud*, pp. 255 - 357; Helen Lackner, *A House Built on Sand*, London, 1978, pp. 60 - 69.

② Soraya Altorki and Donald P. Cole, *Arabian Oasis C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Unayzah*, Austin, Tex., 1989, pp. 119 - 207, offer a long discussion on the effects of the market economy.

达到 100 万人)。<sup>①</sup> 康纳德·科尔 (Donald Cole) 指出, “20 世纪初, 游牧民的比例占绝对多数, 而此时游牧民所占比例下降至 25%”。有报告显示, 游牧民所占比例可能低至 10%。<sup>②</sup> 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民众的职业观念发生转变, 更加倾向于从事商业和白领工作, 而不是体力劳动或者贸易。民众建立了新住所, 消费主义逐渐增长。沙特由一个平等的社会发展为一个以新技术和收入差别来划分阶层的社会。王室家族成员既享有王室津贴, 又从事商业, 他们与高级乌里玛以及一些平民家庭的贸易商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上层; 在政府工作和私人企业工作的专业人员和技术专家形成了一个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 无技术的城市工人、游牧民、无土地的农村人口和将近两百万的外国劳工则处于社会底层。

20 世纪 70 年代下半叶, 沙特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主要体现在现代化的到来、身体负担的减轻、教育免费以及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与此同时, 这些变化也给社会带来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国家行政管理的不断扩大能够推动社会变迁, 但是并不能控制其局限性。也就是说, 国家机关没有对正在经历社会变迁的不同人群给予同等发展的机会和同等待遇, 也没有提供参与政治的渠道、没有建立政党或代表机构来表达各阶层的政治意图。此外, 国家机关既没有提供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 也没有提供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弥补由这些变化带来的错位感。这些问题的共同点是社会解体的重建。社会解体在消除了传统部落间和地区间的差异的同时, 也带来了包括社会分层、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不同的新问题。因此, 挥霍无度的上级阶层与由雄心勃勃的技术专家和官员组成的新兴阶层的关系日益紧张, 这与其他中东国家的社会情况大同小异。沙特中产阶层人数占劳动力总人数的 8%, 日益成为潜在的反对力量。<sup>③</sup> 作为对促进商业的回报, 中产阶层有合法的权利收取佣金, 他们挥霍性消费拥有奢华的生活。传统价值观的瓦解加剧了意识形态的迷失。200 多万名外国劳工投身大型建设项目, 他们是

① Shirley Kay,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Saudi Arabia,” in T. Niblock, e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Saudi Arabia*, London, 1982, pp. 171–185.

② Donald P. Cole, “Bedouin and Social Change in Saudi Arabia,”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16 (1981): 128–149; P. A. Kluck, “The Society and Its Environment,” in *Saudi Arabia: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D. C., 1984, pp. 57–132.

③ N. Safran and M. Heller, *The New Middle Class and Regime Stability in Saudi Arabia*, Harvard Middle East Papers, No. 3, Cambridge, Mass., 1985.

社会的新元素。公众已经意识到了这些新的差异，加剧了国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sup>①</sup>

现代化对正在定居的游牧部落和新定居的部落民众的负面影响尤为突出。部落的生态完整性和政治自治遭到破坏；实际上，由于定居化，部落早已走向瓦解。政府开办农业示范区（在索罕盆地、哈尔杰和贾布尔堡）主要集中在北部的沙马尔部落和南部的阿勒穆拉（Al-Murra）。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这些地区遭受严重的干旱之后开始试点，这项活动很难成功。由于缺乏足够的水资源和技术装备，这些较大部落在适应定居生活时处境艰难（每个示范区都有1000多个家庭），有些部落蔑视农业，从而阻碍了部落的全面定居化。

然而，这些活动产生了更加复杂的定居化现象，即废除了部落对放牧地区的独占权。1968年颁布的一部法律规定向部落成员分配小块土地。在政府技术和资金的支持下，部落内部出现了小地主集团。数以万计的劳工受雇于阿美石油公司而定居下来。<sup>②</sup>其他部落成员的收入来源包括国民警卫队的抚恤金、政府便捷贷款和在新兴城市临时工作的薪资，即便如此，部落成员仍旧保持着游牧的生活方式。他们能够如此受益于现代化提供的便利，如卡车、青年教育以及城市就业工作机会的增多。城市对定居生活具有吸引力，同时也是游牧民生活费用的来源，因此部落成员往往混合两种生活方式。雪莉·凯（Shirley Kay）发现，这个过程是一种“半定居”的形式。贝都因人在城市做了一段时间的无技术劳工，拥有收入和一辆卡车后又回归游牧生活，但是最终还是被完全定居化。<sup>③</sup>

部落居住模式的改变对部落成员与社会各阶层的混合的影响体现在政治和社会文化方面。一方面，部落酋长是中央政府和部落各成员之间的调解者，他们依靠大土地主的身份逐渐进入上层社会。另一方面，许多普通

① M. Abir, *Saudi Arabia in the Oil Era*, Boulder, Colo., 1987, pp. 139 - 148; see D. Horowitz's *Discussion of Group Comparison in His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85, pp. 141 - 184.

② Ugo Fabietti, "Sedentarization as a Means of Detribalisation: Some Policies of the Saudi Government towards the Nomads," in T. Niblock, e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Saudi Arabia*, London, 1982, pp. 186 - 197; A. H. Said, "Saudi Arabia: The Transition from a Tribal Society to a Nation,"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82.

③ Kay, "Social Change".

的部落成员构成了社会的底层，这些人缺乏技术、教育和收入，一般住在大城市郊区的棚屋内或者保持一种游牧或农耕的生活方式。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有着很大差异，其中很多人不满并逐渐远离新的西方化生活。

在社会快速变迁和走向富裕的过程中，部落价值观和部落元素仍起着重要作用。但是，部落并不要求回归旧的酋长制，大部分定居人口支持国家及其新制度。富有的、集权的、官僚化的政体是不可逆转的，并且已经被社会广泛接受。很多研究都提到游牧民和定居的部落民众对已经改善的医疗和教育设施的利用。<sup>①</sup>

国家行政管理虽未导致社会差距，但也未能解决这个问题。然而，部落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缩小社会差距的作用。部落价值观的作用是为处于社会变迁中的民众提供一种熟悉感和延续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行政管理和政治生活方面，部落价值观对民众陌生的官僚机构和缺乏政党的体制起到了补充作用。国家的统治阶层，尤其是王室家族的王子或高级官员与原有部落中可信赖分子以及其他合作者建立起了联系网。这些联系为高层领导人提供了政治支持。另一方面，他们将高层领导人视为恩人，不用经过陌生的官僚渠道就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这种恩庇关系利用了部落合作和寻求政治支持的惯例。最终这个网络形成了一大批被庇护者，他们依赖于王室家族。正如阿齐兹·阿泽姆（Aziz Al-Azmeh）所言，“其他氏族从属沙特政权，不再是游牧的生活方式，他们被纳入沙特财富的再分配体系中，津贴和公民特权代替了掠夺品，如外国商人合法的赞助费，一定程度上与勒索保护费相类似”。因此，部落制度处于支配地位，不再是临时合作或是多余的社会结构。<sup>②</sup>

部落机构也是非官方讨论的重要场所。部落会议由埃米尔和部落长老组成，他们裁决民众日常问题，为庇护团体请愿以及讨论决策。表面上看，部落价值体系限制和取代了国家体系；实际上，作为民众熟悉的、可适应的体制，部落价值体系是对国家体系的补充。部落价值体系并未取代国家行政管理，而是对其进行了修正，使民众更易接受。因此，在国家机构的

① Cole, “Bedouin and Social Change”; Taha al-Farra, “The Effects of Detribalizing the Bedouins on the Internal Cohesion of an Emerging State: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73, pp. 204–208.

② Al-Azmeh, “Wahhabite Polity”.

权力扩张中,部落价值体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对于那些高层领导来说。部落价值体系的重要性体现在对沙特“政府”与“国家”的区分上。在部落价值观中,民众认为“国家”是冰冷的并对其表示厌恶,但对国家的领导者“政府”则表示同情,因为“政府”这个术语包含了恩庇关系,将王室家族与政府其他成员联系起来。

部落价值观有助于认同的形成和人们适应国家的新政体。城镇形成了恩庇网络和其他联系网,<sup>①</sup>新的居民之间出现了部落联盟。这不仅实现了行政管理的目标,而且通过消除分歧、削弱社会差距对个体的影响缓解了民众因社会差距而带来的不安情绪。部落价值观为以族裔或职业为基础建立的集团重构了一个熟悉的、受承认的及类部落的认同。这些集团又受政府官员或王子的领导,由此增强了他们对国家的支持与认同。王室家族形成了两万人的联盟,不仅代表着20世纪30年代显要家族的利益,同时也代表着有共同利益以及与王室通婚的盟友的利益。<sup>②</sup>

部落价值观形成了涵盖不同集团的部落精神,认同于传统、朴素、保守的主义和宗教。有趣的是,虽然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部落价值观与瓦哈比教义在定居化和停止劫掠方面相互矛盾。但是,沙特王国地区关系的改善却终止了劫掠活动,推动了定居化。因此,部落价值观和瓦哈比教义的差异逐渐减少,部落成员的后代能够很好地协调两种价值观;结合两种熟悉的、共同的价值观立场也有助于完善变革。部落价值观代表着传统的发展方向。

部落价值观有时也有消极作用,主要体现在集团规范与国家现代化的不协调。对缺水的恐惧、农耕的失败以及定居化中艰难处境的深刻印象使得他们的受剥夺感、贫困感和受虐感十分强烈。<sup>③</sup>阿卜杜拉·本·拉赫曼·穆尼夫('Abd Al-Rahman Al-Munif)在一部寓言小说中提到,阿尔阿萨石油工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民众对政府的怨恨。他将石油工业描述为沙特社会苦难的来源。小说名为《盐城》,其实意指石油城市,石油工业没有深植

① Abir, *Saudi Arabia in the Oil Era*, p. 73.

② Gary Samore, "Royal Family Politics in Saudi Arabia", Ph. 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5; see also Waddah Sharara, *Al-Ahl wal-Ghanima*, Beirut, 1981, pp. 171 - 207.

③ Motoko Katakura, *Bedouin Village*, Tokyo, 1977, p. 26.

于沙特社会，因此可能面临崩溃。<sup>①</sup> 穆尼夫在其 1984 年出版的小说中借由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混乱表达了对国家的怨恨，特别是这本书强调了当时流行的看法，一旦平等主义且无分层的社会出现等级之分，那么领导人就会变为压迫者，与民众的关系就会越来越远。

20 世纪 70 年代，在麦地那大学的研究中，这样的态度颇受底层部落成员的支持。基于以下两点原因，民众把王室家族视为破坏者和落后者。一是快速发展时期意识形态的迷失和社会的掠夺；二是穆斯林民众复兴主义情绪的高涨，这种情绪是经埃及、也门和巴基斯坦的劳工传至沙特阿拉伯的。1979 年 11 月 20 日，沙特在麦加大清真寺抓捕了试图刺杀王室领导人并推翻其统治的百余名部落成员。<sup>②</sup> 虽然这种尝试是徒劳的（占领清真寺几周后，叛乱就被粉碎），但是部落成员对变革带来的影响值得关注。

沙特领导人的主要反击策略是强调自身的部落与宗教背景，将部落成员视作社会共同的建设者来调整部落价值观。哈立德国王（1975 ~ 1982 年在位）和法赫德国王（1982 ~ 2005 年在位）为此付出了很大努力。

正如 20 世纪 20 年代的领土扩张一样，快速的现代化为国家构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除了清真寺事件，1979 年至 1980 年什叶派在阿尔阿萨的暴动和戴维营协议签订后沙美关系的紧张都证明了国家构建的脆弱性。自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起，政府开始寻找新型的国家构建机制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速度。在农村和外围地区的发展方面，政府的重点是阿西尔的农业计划、汉志和阿尔阿萨的石油化工工厂项目（尤其是延布和朱拜勒项目）和盖西姆建立贸易中心的计划。<sup>③</sup> 第三个五年计划（1980 ~ 1985）为提高农村生活标准做了特别安排。政府放缓了城市化的速度，增强了游牧民和农村人口的信心。法赫德国王常常赞扬受部落价值观支配的农村是多么稳定，其居民是多么正直，并且认为繁华的城市往往是堕落与不稳定的。<sup>④</sup> 沙特领导人希望扶持农村居民，从而使全国民众具有令人信服的共同特征。

1982 年以来，沙特经济因石油大幅减产而萧条。政府把重点放在综合

① 'Abd al-Rahman al-Munif, *Mudun at-Milh*, Dammam, 1982.

② James Buchan, "The Return of the Ikhwan 1979," in Holden and Johns, *House of Saud*, pp. 511 - 526.

③ Financial Times Supplement, 5 May 1981.

④ See Al-Mustaqbal (Beirut), 31 March 1984; Al-Sharq al-Awsat (London), 29 March 1984.

性的国家建设项目上, 以此削弱经济萧条带来的负面影响, 并且鼓励私人企业资助公共项目来弥补政府资助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 中产阶级商人在王国的作用与地位有所提高。<sup>①</sup> 通过维持食物的高补贴、免费教育、医疗服务以及王子与底层不断的交流, 政府对底层、游牧民、农村人口和城郊部落集团的整合程度也有了明显提高。<sup>②</sup> 为了促进社会团结和寻求支持, 政府广泛削减预算, 这也是公共开支合理化的一种方式。

综上所述, 纵观 20 世纪的沙特, 部落社会和价值观对国家形成的影响十分复杂。在沙特领土扩张时期, 部落因其拥有军事和政治权力而成为国家构建的主要推动力。它不但没能在国家维系一种松散结构的酋长制, 同时还受到了以中央集权和发展为目标的政权的挑战。新政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在新的国家制度和官僚机构建立后, 部落行为模式和价值观依然盛行。实际上, 两者是相互依存的。部落价值观在反对力量运动的背后隐约可见, 但同时也帮助政府完善了国家政策。沙特国家在确立领土、政权、社会结构和集体认同等方面处处都留有部落价值观的印记。

---

① Wall Street Journal , 20 December 1983.

② Al-Sharq al-Awsat , 29 March 1984; Al-Riyadh ( Riyadh ) , 14 September 1983; see also “Planning Minister Hisham Nazir’s Outline for the Current Five Year Plan” , Saudi Press Agency , 5 December 1983 , published by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 7 December 1983.



## Transforming Dualities: Tribe and State Formation in Saudi Arabia

*Joseph Kostiner translated by Yin Jin*

**Abstract:** Joseph Kostiner,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Tel Aviv University in Israel, focus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Saudi Arabia and Yemen. He points out in the following essay that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state of Saudi Arabia are influenced by tribal values. The Saudi chieftaincy underwent two dialectical phases of state formation, each composed of a drastic period of change followed by a period of adjustment. One period of drastic change began in the late 1910s and continued into the 1920s. It featured territorial expansion and incorporation of new populations. The state has initially established new systems and bureaucratic systems to restrict tribal power. However, tribal patterns of behavior and tribal values are still prevalent in the Saudi polit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has not changed. During this period, the state system and tribal system exist in parallel. Another period of drastic change, in the late 1960s and the 1970s, was notable mostly for an infrastructure buildup and the improvement and entrenchment of the administration in society. Saudi Arabia reconstructs its polity, creating a new model of tribal-state interaction. The changing functions of both tribal power and values are the keys to understanding Saudi state formation.

**Keywords:** State Formation, Tribal Values, Centralization

## Review on the Study of Arab Shi'as

*Li Fuquan*

**Abstract:** Foreign Arab Shiite study began in the 80s of last century, and in recent years works continue to emerge. The study shows obvious national differ-